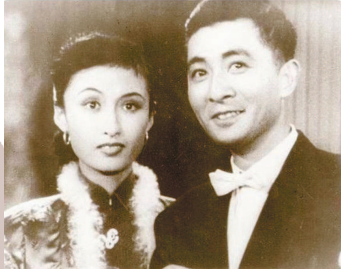


和赵丹剧照
《乌鸦与麻雀》黄宗英



赵丹离开我们四十三年了，若天假其年，也是百岁老人了，可惜他仅活了六十五岁。然而，他在银幕的形象，却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！

在赵丹、黄宗英家里

赵丹(1915年6月27日—1980年10月10日)，刚刚学步就随父母走向南通城。应该说，赵丹是我真正的同乡，我们两家仅几十里之遥。从小，我为有赵丹这个老乡而自豪；从小，我看过他的《马路天使》《乌鸦与麻雀》，凡逢赵丹的电影必看，一看再看，《聂耳》《李时珍》《林则徐》的形象永留脑海中。“总有一天，我要拜见赵丹”，从小我立下这个心愿。

天遂人愿！
宋朝文学家辛弃疾有名句：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见赵丹，就是这种境界。

那是1980年清明前后，我受命创办儿童文学杂志《小溪流》，茅盾题名后，我便从北京飞到上海，想在创刊号上把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名作家、画家的新作集中展示，让读者眼前一亮。所以，北京的叶圣陶、冰心、张天翼、严文井，上海的陈伯吹、贺宜、张乐平、峻青等都列在我的组稿名单上。

清明节那晚，由《儿童时代》资深编辑苏玉孚陪同，在乌鲁木齐北路峻青先生家坐了一阵，看看表，还不到回饭店的时候，“再去看看谁呢？”我这样问。

“我陪你去看看赵丹、黄宗英夫妇，他们就在淮海中路，不远！”我一阵惊喜，拍了一下后脑勺：“我真笨，怎么没有把赵丹、黄宗英列入组稿名单呢？”“黄宗英现在当作家了，但她不写儿童文学，赵丹是表演艺术家，跟儿童文学不搭界！”老苏宽慰我，“不过，你们南通老乡见见面总有好处。”“大有好处，我从小对赵丹崇敬如神呢！”

于是，我们在沾衣欲湿的杏花雨和拂面不寒的杨柳风中，步行到新康花园的一座二层小楼。老苏说：“到了，就这座小楼！”

赵丹、黄宗英正在楼道左边的客厅里看电视，一见我们进来，赵丹连忙起身，以人们最熟悉的那种带酒窝的笑容，跟我们握手，右手食指指着鼻梁：“找我，还是宗英？”

我们说，两个都找，先找宗英老师。

“好，好！”赵丹把我们引到过道当头朝阳的会客室暨工作室，黄宗英给我们让了座，她自己在我们右手沙发上落座，这时，刚刚出去的赵丹又探进身，把一包凤凰牌香烟丢给黄宗英，又跟我们用上海普通话打招呼：“你们先谈，我在隔壁看电视，张瑞芳主演了一部抗美援朝的片子，要我提提意见。”听得话尾子带着南通土音，是在电影里我们听惯了的声音。

黄宗英十分客气地给我们递烟，直到我点着了烟，她才坐回沙发上。老苏为我做了介绍，我打

赵丹赠我寿星图

◆ 金振林



▲ 赵丹画作《寿星图》

▲ 赵丹与黄宗英

本版照片系摄影家海德供稿



江苏省南通市实验中学内赵丹塑像

量了一下黄宗英，她五十五岁，比赵丹小十岁，有些发福，面部的线条仍然十分柔和明朗，那一对大眼睛是深沉的，她头戴浅红色绒线小帽，给人的感觉文静素约，是个十分可亲的“甜姐儿”。

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向她约稿。她说，过几天和阿丹去新疆，准备写些游记之类。她反过来问：“你们《小溪流》有些什么可供我朗诵的么？”我讲，创刊号正在筹划，“六一”前可能来不及了。原以为她给电台朗诵。“不，就是朗诵给孩子们听呢，我还担任北京景山学校的校外辅导员，我用磁带，把我的表演录下来，带给景山学校。”

提起新疆，那可是赵丹的伤心之地。

1939年6月，赵丹一行去新疆开拓戏剧工作，被两面派的反动军阀盛世才囚禁五年，1945年春才回到重庆。

传说，赵丹已经牺牲，他的爱妻叶露茜痛不欲生，多次自尽未果。后来与剧作家杜宣结为伴侣，待赵丹出狱后：二人见面是多么痛苦，又多么尴尬，赵丹妻离子散，孤身一人。但后来与“甜姐儿”黄宗英重组了新家，如今儿女成行，女儿赵桢还在老苏的《儿童时代》上发表文章。黄宗英说：“她想写，我不让她写，别以为作家的女儿就要当作家。”

我们知趣地想早些离开，因为来访的客人很多，而且二人正在观看张瑞芳的新电影。



▲ 《幸福狂想曲》剧照

赵丹举起右手，做了兔儿头的手势，然后，食指和中指夹起，靠在右额边，这个在《乌鸦与麻雀》中小广播多次出示的手势，亿万人都记得，而且永远在我脑海中定格。

这是我在生活中跟老乡赵丹第一次见面，也是令人扼腕慨叹的最后一面。

赵丹黄宗英十分守信，我回长沙不久，便收到了赵丹画的老寿星，一尺多宽、三尺多长的宣纸上，白胡子老翁手持红杖，头如寿桃，长鬓拂地，慈眉善目，手书“一九八〇年初夏赵丹戏笔”，并有“阿丹”小印，只是未写我的名字，因为是要制版在杂志上发表，他答应下次去沪时再补写。

那是长沙多雨季节，这幅象征《小溪流》长流不息、永不言老的寿星便安排在第二期，用了封底整个版面。赵丹对孩子，对《小溪流》的关爱之情，以及难以言表的生之眷恋，温暖我感恩于心，每见老寿星，就闪现他最后的笑容，令人唏嘘。

苏玉孚在信中告知，赵丹黄宗英新疆之行搁浅了，赵丹病了，牙齿疼，便拔了一颗又一颗，快拔牙了。俗话说，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就要命，可以想象，赵丹吃尽了苦头。在北京检查后，排除了癌症，又回到上海的华东医院治疗。

巴金谈赵丹

在华东医院，赵丹与巴金不期而遇，巴金在《随想录》里写道：

“他(赵丹)乐观，充满着信心，我看见他总觉得他身上有一团火，有一股劲……我没有料到今年(1980)7月会在上海华东医院里遇到他，他在草地上散步，我在水池边看花，他变了，人憔悴了。他说他吃不下东西。他刚在北京医院里检查过，我听护士说，癌症的诊断给排除了，还暗中盼他早日恢复健康。我说：让他再拍一两部好片子吧。”

华东医院草地上的相遇，是我和赵丹最后一次的见面，我从北欧回来，听说他病危了。”

不久，老苏又来信说，赵丹在北京确诊为胰腺癌，不久，我在1980年10月8日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赵丹在病床上口述的最后遗言《管得太具体……》

10月10日，赵丹病逝后，文坛巨匠巴金寝食不安，一连写了《赵丹同志》等四篇随笔，共计六千余字，巴金说：

“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，想说而说不出的话，可能他讲得晚了些，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。我提倡讲真话，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。我也在走向死亡，所以在眼前，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。”